

■新作聚焦

叶炜长篇小说《福地》：

乡土叙事需要多维视野

□鲁太光

《福地》中，叶炜以麻庄这一鲁南苏北“典型村庄”里的“典型农民”老万一生的故事为线索，结构起中国农村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后近百年的历史。

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历史的风云激荡，更看到了历史褶皱处的微观景观，看到了人心的多样与人情的微妙。

作为“乡土三部曲”的压轴之作，《福地》自然离不开有关“乡土中国”的大历史叙事。具体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叶炜以麻庄这一鲁南苏北“典型村庄”里的“典型农民”老万一生的故事为线索，结构起中国农村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后百余年的历史。其间自然少不了战争的血雨腥风，少不了时代转折时的酷烈与紧张，少不了极端年代的极端行止，但整体而言，叶炜写这些“大事”似乎只是为了给小说确定经纬，就像一位高明的画家，在以刀砍斧劈般的笔法为画幅框定间距后转向细部，以工笔经营线条与结构、色彩与意蕴。

叶炜之所以在小说中讲述“大历史”，一

个极其重要的动因就是借大历史烘托人物，呈现主题：为什么“麻庄”是福地？为什么任凭山水流转、风来雨去，人们依然痴心不改，坚守这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叶炜在小说中塑造了老万这个人物。

老万身上体现了小说《福地》的一重新意，即叶炜是以多维视野来观察这个人物的，因而使其有所突破，有所不同。在《福地》中，叶炜通过老万这个人物写出了“乡绅”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观察地主往往只有“阶级”这一个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中，地主是“恶”的代表，是压抑乡土活力的反动力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许多作品都是这样写地主的，不用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革命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身上也不乏这样的特点。新时期以来，一些作品虽然开始从不一样的角度写地主，但大多没有脱离“阶级”的视角。如果说在特定年代这样的视角有其特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多元化的社会中，这一视野难免失之偏颇。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观察乡土中国，换一个视角观察乡土中国中的万千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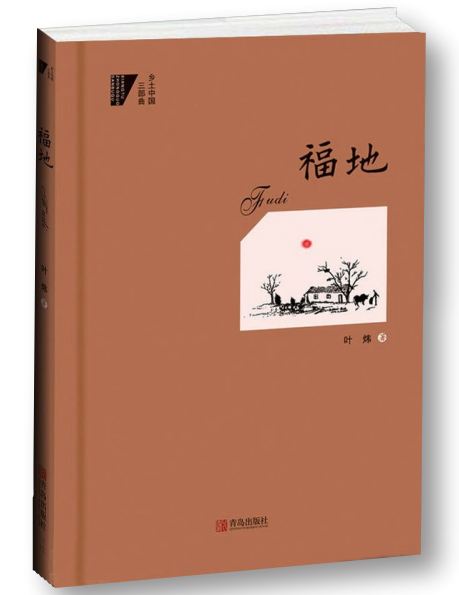
在《福地》中，叶炜实现了这种视角转换。在《福地》中，对于老万，叶炜更多地将他当做一个乡绅来看待和书写。与地主这一阶级身份所折射的单一维度不同，乡绅这一文化身份包含着更多的历史内容与可能性。这个转换不仅为人物开辟了新维度，也为小说开辟了新空间。

“乡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在乡土中国，他们身上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在乡村经济事务、社会管理、风俗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也就有其坚硬甚至

“暴力”的一面；另一方面，乡绅又有保护乡土的作用，是乡土的守护者，因而又有柔软乃至“温情”的一面。在《福地》中，叶炜把老万的这种双重身份表现得非常充分：作为“保护者”，他不仅与周围山上的土匪周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女——他的小女儿欢喜就是因为他害怕土匪孙大炮为害乡里而“送”给他做干女儿的，而这也导致了欢喜一生的悲剧；当日本侵略者到来时，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这个时候，老万一方面号召乡亲们坚壁清野，一方面购买军火、守护村庄；当灾荒来临时，他把自己存储的粮食分给乡亲们，使其得以保命。一个最为动人的细节就是庚子年间大旱时，早已被赶下麻庄神坛的老万竟然拿出自己家的保命粮，让麻庄的村民择地打井，抗旱自救……

同时，作家也没有过分美化老万，忽略他身上“恶”的一面，这种辩证的视野不仅丰满了老万这个人物，而且丰富了小说叙事。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历史的风云激荡，比如麻庄人民抗日驱寇的壮烈场景，更看到了历史褶皱处的微观景观，看到了人心的多样与人情的微妙。比如，作为麻庄的“管理者”，老万自然要为其恶行承担责任，因此，当陆小虎成了麻庄的掌权者，老万不可避免地被判刑、被批斗。不过，在描写这一场景时，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那样鲜血淋漓、你死我活，而是有其温情的一面。比如，在陆小虎领导农会批斗老万时，王顺子竟说他“这些年在麻庄为咱们做了不少好事”，使批斗变成表扬，洋溢出一丝难得的幽默。而此后对老万的多次批斗，也大多是巴掌高高举起，而后又轻轻落下，甚至在陆小虎和老万之间生成一种默契，使批斗成为一种“表演”。

这就涉及到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



礼义与温情。

叶炜之所以在《福地》中塑造老万这个人物，并以他为线索串联起鲁南苏北农村百余年的历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传达这片土地上漫漫的礼义与温情。在小说中，叶炜很少书写残酷，对老万是这样，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是这样。老万的大儿子万福似乎是小说中最令人生厌的角色了，他行为不端、乱伦偷情，甚至沦为汉奸，可谓无恶不作，但叶炜却在小说结尾来了一个温婉的回还：当“文革”期间香子由于被羞辱而要自杀时，竟然是已经日渐老迈的万福激活了香子熄灭的生机，万福也在这其中救赎了自我。正是这礼义与温情，使苦乐伴生的麻庄成了人间“福地”，让村里的人愿意像村头那棵老槐树一样，守望千年，无怨无悔。

小说就从对历史人物的观照转入了对读者人生自我的认识。

不过，这部小说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且这一缺陷在今天的长篇传记乃至长篇历史小说写作中也颇具普遍性。其一，小说名为“传奇”，就是既遵照史实的真实，又有着文学虚构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更易引发当代读者的共鸣，这是写历史人物传记乃至写历史小说的一个长处。但在这其中，却不可以现代人的心理、行为、对话代替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物的言行。《张凤台传奇》在写男女情爱关系时将古人言行更多地现代化了，损害了小说的历史的严肃性；其二，作品的各部分之间颇多悬殊，有些部分不乏精彩，有些部分则甚为粗鄙。如何有效手段，提升长篇质量，是当今文学时代的一个现实话题；其三，张凤台人生最为精彩之处，一在中原，一在东北边陲，二者的文化形态如何独特而又如何作用于张凤台，本是小说中应该重笔浓墨之处，但作者却将其格式化了。现在，许多作家还是习惯于塑造“这一群”中的“这一个”，不擅长塑造独特的“这个”。

■创作谈

混凝土的力量强大，强大到几乎可以完全覆盖掉整个城市的土层。然而在混凝土构筑的城市空间里，却总能找到土地的蛛丝马迹——试看城市阳台上的那一盆盆植物，还有在那些小小的花盆里栽种下的久违的“庄稼”——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土地从乡下搬到了城市？这小小的花盆里面，盛放的难道不是乡土中国吗？

谁说城市化一定就是乡土的式微？乡土中国的外延，是乡土世界。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故乡”和“世界”是一个辩证的存在。只有看过“世界”，才能写好“故乡”；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写好“世界”。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绕，我们可以换一种表达：只有看过世界，回到故乡的写作才能更有底气；只有回到故乡，其写作才能有世界性的意义。

我多次说过，自己要深挖新乡土文学创作这口深井。我以为，当下中国需要新乡土写作，这个新乡土写作毫无疑问首先需要的是继承传统、扎根本土，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写出新的乡土中国。同时，新乡土写作也需要一种创作的世界眼光，只有立足于“世界性的通感”，才能写出具有普遍人性反映世道人心的新乡土力作。“新乡土写作”离不开“土”“洋”结合、“虚”“实”相生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亦是这方面的一个实践。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福地》的创作中，我力图打通天人鬼神，以人类的大通感来写苏北鲁南的那个小麻庄。在写作中，我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勾连，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游离，让小说在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超现实主义写作的新路子。“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的创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践。

群山看過，方知村前大山之小。新的时代环境下，没有“看过世界”的乡土写作常常会受制于前辈作家一再书写过的旧日上，其结果往往是被强大的中国乡土书写传统所淹没。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尤其是《福地》的写作中，我极力避免重蹈前辈作家的覆辙，力求写出新的乡土中国。因此，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有了一些新的结构、新的视角、新的叙事、新的语言，这些构成了我所推崇的具有“大小说”特点的新乡土写作。

回到故乡，才知世界之于乡村的意义。乡土中国有着强大的乡村叙事传统，几代作家对中国乡土写作的一再开掘，众多作家对乡村的杰出书写，几乎把乡土中国的写作资源消耗殆尽。如果没有新的文学视野，没有新的思想境界，没有新的写作手法，新乡土写作就很难称其为新。只有有了世界的大悲悯、人类的大通感，新乡土写作才可能对已有的乡村叙事有所超越。为此，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尤其是《福地》写作过程中，我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最根本的是写作者必须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扎根处，重新出发，才能让世界的情感在自己邮票大小的“根据地”落地开花。

从小在土地里摸爬滚打，我的身上天生有一股子“土”味。虽说从读大学开始，我就开始远离家乡的土地，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游走，但自感身上的土味从未减少半分。如同家乡土地上的那一棵棵大树，我的生命根系深深扎进了家乡的土层。无论迁徙到哪里，脚下始终粘着家乡的那一把“土”。或许，我这一生注定走不出家乡的目光，自己身上的“土”味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浓烈，而这“土”味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我的写作。

从200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在小说创作这个行当里已经摸索探究了15年。回头看去，最满意的还是那些带着些许“土”味的作品。“乡土中国三部曲”是我15年创作的总结，也是我青年时代写作的一个精神证词。我把家乡的“土”味移植到小说的园地里，在这里探求精神的来路，寻找生命的尊严。

■短评

如何书写历史中的“这一个”

——读章砚长篇传记文学《张凤台传奇》

□傅书华

新世纪之后，非虚构写作、传记写作逐渐被作家所重视，章砚的长篇传记文学《张凤台传奇》就是其中的一个收获。张凤台是晚清治理东北长白山地域的知府，后任民国初期的河南省长，在这两任都有不俗表现，广为民众所拥戴。作品不仅彰显了一个传统的清官形象，而且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亦有颇多启示。

在许多传记文学中，人物塑造往往是红脸白脸、忠臣奸佞、好人坏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立，《张凤台传奇》破除了这种陈规，再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真实的清官形象。作者写了张凤台为了化解官民矛盾，既维护百姓利益，也对官员王一鸣颇多妥协；既拒收王一鸣的贿金，也对下属的有限

灰色收入并不严苛，甚至自己也将王一鸣送的古籍书画转送给上司徐世昌。诚如作品所展示的，一个农夫吃饱穿暖即可生存，一个官员的生存却实非简单，而没有了生存，也就失去了作为的空间与平台。怒目圆睁、挥舞利剑，眼里不容半点沙子确实痛快、酣畅淋漓，却也如作品中所说的是“理想之愿而非红尘之事”。可惜的是，这样的描写在今天的所谓反腐小说、官场小说中为数众多。

与之相应地，是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治理社会的价值立场。这一立场表现在张凤台对洪秀全、义和团等暴乱行为的不可不，也表现在对张凤台用妥协态度调和官民矛盾的价值认可上。当革命的时代成为过去，当共产党从革

命党成为执政党，当革命的思维转换为建设的思维，不是从理想性的价值谱系批判现实，也不是一味地从眼前利益出发，而是从治理社会、建设社会的可行性出发，这样的价值立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张凤台这一形象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官员真实的生存形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代有为的青年人是如何一步步步入社会高层，走向成功或者失败的。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张凤台的家庭形态以及少年读书经历对其一生的影响。而其后的宦海生涯，既是其个人生命形态被社会形态规训的过程，也是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冲突的过程。可以说，读者阅读张凤台的过程在某种角度上，也是在观照自己。如是，

专家研讨《布衣壶宗——顾景舟传》

本报讯 日前，书写紫砂一代宗师顾景舟人生历程的长篇传记《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首发式暨研讨会在江苏宜兴举行。陈建功、张胜友、何镇邦、张王飞、汪政、丁帆、王彬彬、高伟、刘颖等与会研讨。

今年是紫砂泰斗、一代壶艺宗师顾景舟的百年诞辰。作家徐凤以近三年时间创作了顾景舟传记作品，全书35万字。为写好这部作品，作者遍访传主故交、家属、学生，70余人的受访回忆，呈现了一代宗师的人生脉络。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书在写法上新颖别致，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文学笔调，将多种文体打通，文字清隽好读，对顾景舟各个阶段人生

坎坷际遇，均有出彩描述。不虚美、不隐恶，观点力求不带偏颇，客观公正。更可贵的是，作者写出了顾景舟的思想脉络史，通过一把紫砂壶连接起江南文化史、器物史、手工艺史，并着力探究顾景舟所开创“文化茶器”的底蕴出处、源流走向，评述顾景舟对紫砂事业的贡献，及其在中国紫砂史上的地位。作品对其各时期代表作点评赏析，精当扼要，对他如何悉心培育徒弟、学生，有生动叙写，展示其文人士子之心、重情重义之举，以及不畏权势的铮铮铁骨。该书首次披露的顾景舟晚年日记、书信手札、书法作品、临终遗嘱等原件十分珍贵，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对顾景舟及一代壶人的深刻影响。

《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首发

本报讯 11月15日，《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在京首发。该书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组织编写，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分上篇（西方）和下篇（中国）两大部分，全书约60万字，图片总数500幅。

近年来，我国相继推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各省区市也都制定了各自的创作计划，中国国家画院也有针对性地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首发式上表示，这种现象表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在

当代美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一个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历史情境的转变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理解和把握深度题材与艺术家的个人风格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高度予以回答。杨晓阳说，从目前来看，对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也正是基于这一状况，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启动和策划了这一课题。课题立足中国而放眼世界，力图从对中外不同地域和时代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方法、特征的梳理与比较中，思考和探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规律与理论。

《朗朗在巴黎》向大师致敬

本报讯 今年10月，朗朗最新独奏专辑《朗朗在巴黎》在全球发行。11月3日，朗朗携该专辑做客国家大剧院“走进唱片里的世界”栏目，与乐迷分享新专辑背后的故事。

今年6月22日，朗朗在法国巴黎举办了钢琴独奏会，《朗朗在巴黎》这张新专辑正是再现了独奏会当天的盛况。专辑中收录了肖邦

的4首谐谑曲和柴可夫斯基浪漫的钢琴套曲《四季》。《朗朗在巴黎》不仅是朗朗对两位大师的致敬，更希望将他们的精神延续下去。当天，朗朗宣布他即将在12月开启个人内地巡演，并于2016年1月3日压轴国家大剧院。索尼音乐制作的《超越无限》典藏合集将同期推出。

（王 觅）

章剑华“故宫三部曲”：呈现故宫百年历史

本报讯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剑华“故宫三部曲”《变局》《承载》《守望》日前举行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与会者谈到，“故宫三部曲”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打捞出故宫博物院近百年的历史，在真实的基础上还原并复活了这段历史，记录了故宫博物院的人物和文物。作品史料翔实，结构庞大，叙事生动，是一部难得的文学性“故宫通史”，对于记录和传播故宫历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欣 闻）

江立峰工笔画巡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15日，为期一周的“万水千山 情韵东方——江立峰工笔画全国巡回展”在三品美术馆北京馆举行。此次展览由云锦苑苑和三品美术馆共同主办，展出了画家近10年来创作的50件（组）勾描细腻的工笔仕女人物画。展品既有彰显盛唐风韵的《丽人行》《贵妃不醉三郎醉》、颇具怀旧情调的《思雨》《花季》，又有精美的《琴棋书画》四条屏、耗时大半年完成的《金陵十二钗》组画等。

江立峰为该展览筹备近3年。北京展览结束后，作品还将在三品美术馆深圳馆、贵阳馆和香港云锦画苑巡回展出。

于浩成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1月14日在京逝世，享年91岁。

于浩成，笔名吴澄。满族。北京人。中共党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新绿书屋笔谈》《鸣春集》《当代杂文选粹——于浩成之卷》等。

熊元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党员，《文艺报》编审、理论部主任熊元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1月15日在京逝世，享年51岁。

熊元义，湖北仙桃人。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文艺理论专著《回到中国悲剧》《中国悲剧引论》《当代文艺思潮的走向》，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文集《拒绝妥协》《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眩惑与真美》等。

李凤祥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李凤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1月13日在京逝世，享年75岁。

李凤祥，笔名凤翔、落葵等。河北满城人。中共党员。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神拳儿女》《凤翔散文选》，文艺评论集《戏剧人物面面观》《谈史说戏》（合作）、《诫子弟书》（合作），编著《北京风物游览典故》等。

今夜因诗歌而风雅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歌委员会主办、北京今歌风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今歌风雅·诗歌之夜”活动日前在京举行，100多位诗人在京举行，100多位诗人在京举行，100多位诗人在京举行。

这是一次充满诗意与友情的聚会，有诗歌、有音乐、有焰火……大家在交流中谈到，诗歌充满温情与力量，它能在我们感到失落的时候给我们信心，在我们悲伤的时候抚慰我们心灵，特别是，它能在普遍的缺失与虚空中充实我们。

此次活动提倡“阅读的传递”，每位与会者皆带来一本已签名的自己的著作或推荐的图书，离会时再随机带走一本，期待以此将阅读传递下去。